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高宣扬作品系列

流行文化社会学

(第2版)

高宣扬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第2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研究”（批准号14ZDB018）的部分成果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高宣扬作品系列

流行文化社会学

（第2版）

高宣扬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行文化社会学/高宣扬著. —2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 高宣扬作品系列)
ISBN 978-7-300-18778-5

I. ①流… II. ①高… III. ①文化社会学-研究 IV. ①G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2733 号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高宣扬作品系列
流行文化社会学 (第 2 版)
高宣扬 著
Liuxing Wenhua Shehuixu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770(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规 格	170 mm × 240 mm 16 开本		2015 年 7 月第 2 版
印 张	28.25 插页 1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53 000	定 价	78.00 元

代自序：在哲学与非哲学中迂回

我的哲学生涯，就是我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生活使我喜欢哲学，哲学使我懂得了生活；浪迹天涯的生活历练以及惊涛骇浪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又加深了我对哲学的理解，并时时推进我的思想情感，穿越人文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通过在各种文本中的循环迂回反思，试图探索生命的奥秘。从十五岁到今天，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在国内外颠沛流离的游牧生活命运，我始终同哲学打交道，并在同哲学的交往中，不断地改变对哲学的看法，而我的命运本身，也渗透着哲学的神秘力量，使我品尝了生命过程的酸甜苦辣滋味。哲学作为生存的一种实践智慧，以其对生命本身的关照和澄明，见证了它无愧是生命的灵魂。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哲学无非是一种无止境的感恩和怀念。当尼采在晚年穿透历史而发出“重估一切价值”的豪迈口号时，他仍然以感恩的心情，由衷地称叔本华为他的最早的“教育者”（als Erzieher）（参见尼采 *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 1873—1876），从而一览无余地展现出尼采的“永恒回归”的广阔理论视野。

在我的哲学生涯中，时时伴随我思想脉动的内在力量，来自我生命历程中的各种遭遇。而在我所遭遇的关键人物当中，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的，就是五个人：我的母亲、毛泽东、马克思、康德和尼采。他们分别地出现在我生命转折的不同时期，使我在亲身经历的 different 生活时空中，从出生入死、苦乐交替的动荡不定生活和深沉反思中，懂得了哲学与生存之间的血肉交融关系，体会到哲学的开放性及其在人生历程、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中进行流连忘返的极端重要性。

1939年初，在阴历虎年岁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声中，我出生在一个漂泊海外多年的华侨教师家庭。我的父母靠他们所获得的暨南大学和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文凭，四十多年如一日，始终任教于华侨教育界。他们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永远都以任教的学校为家。如同萨特从小就

在其外祖父的带领下看书一样，我也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在身为华侨学校教师的父母的教导下，培养出以看书写字为乐的生活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父母不但给了我肉体生命，尤其还赋予我精神生命和哲学灵魂。

打从童年时代起，每当夜幕降临，我就偎依在母亲身边，陪同她批改学生作业，殷切期盼她在夜深人静、改完学生作业之后，字字句句带我习读动人的神话。妈妈耐心地指导我看书，并在阅读中，启发我敞开想象的大门，训练我最初的超越现实的能力，还教我学会查《王云五四角号码字典》和看地图。爸爸则几乎天天在晚饭后的散步中，向我讲述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并严厉地要求我熟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试图让我从人类经验中，体验人生的艺术。从此，查字典和看地图，成为童年时代最吸引我的游戏活动；学校图书馆和挂在教室墙上的各种大地图，也成为我的玩伴和游戏场所。每当我在字典里亲自发现一个新词汇，认出一个新国家、河流、山脉或港口，就喜出望外地向妈妈报告，于是，妈妈就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由此，我慢慢地懂得了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生活道理：以寻求智慧的好奇，扩大自己的人生视野，是真正回报母爱的最好途径，也是享尽令人陶醉的人生饕宴的珍贵机遇。

七岁那年，妈妈教我从头到尾系统地看书的最初读本，是当时学校图书馆藏的《苦儿努力记》和《岳传》。前一本是法国作家马洛（Hector Malot）所写的 *Sans famille*（原文直译为《无家可归》）的中文译本，为中国作家夏丏尊所译；后一本是属于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历史普及丛书。这两本书所散发出来的精神魔力，对我的思想和生命成长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它们不仅一直伴随着我的心灵成长过程，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可以说，它们不折不扣地成为我一生命运的镜子和缩影：我本人所经受的大跨度时空变迁，大起大落，以及一切令人刻骨铭心的生活煎熬和情感震荡，都活生生地重演了两本书的情节。

当我第一次阅读《苦儿努力记》时，首先使我佩服的，是译者夏丏尊先生：他竟把原来法文的著作流畅地译成中文！我当时就暗自立志，长大后要像他那样，成为懂得多国语言的作家。事隔三十一年之后，1978年，我移居法国巴黎，竟然在巴黎地铁网上，找到了《苦儿努力记》所提到过的巴黎东南郊城镇 Boissy-Saint Léger。我兴奋地多次访问这座城镇，东张西望试图发现小说主人公雷米（Rémy）随同抚养他的民间杂艺表演老艺人的历史踪迹。

以后，我又特地两次到《苦儿努力记》所讲述的法国东南弗朗斯孔泰（Franche-Comté）地区度假，来往于瑞士和法国边界，抱着缅怀、同情和鉴赏的态度，反复沉思流浪儿雷米当时徒步穿越这一地区山川大地的哲学意义，因为我已经从我个人亲身经历的哲学炼狱与人生沧桑沉浮的过程中，体会到我同雷米一样，不由自主地在不同舞台上，演出了类似的充满戏剧性的游牧生活遭遇。同样地，《岳传》给予我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一直成为我的不可磨灭的情结之一，每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不管我身在国外何处，也不管我在地球的哪个角落，这一情结如同一股神秘不可测的力量，影响着我的思路和情绪的起伏；而岳飞晚年遭受陷害的悲剧，也在“文化大革命”对我的“隔离审查”和一再地“批斗”中，活灵活现地重演着：人们当时竟然对我的华侨爱国之心，抱着怀疑、鄙视，甚至嘲弄否弃的态度！

这一切，就是我的哲学思想的基础和起点。随后，即使哲学把我带到古希腊、古罗马或古典时期的德国以及当代法国，都脱离不开少年时期母爱和母文化对我的熏陶；同样也无法抚平被残酷无情的现实生活所刻烙留下的沉痛创伤，它们时时申伤着我的心灵，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并以顽强的精神，渗透到我所吸收的一切文化当中；反过来，我的喜怒哀乐情感越是起伏不平，面临的新鲜文化越是层出不穷，我对生活和哲学的“流浪”、“迂回”、“永恒轮回”的性质，就感受得越深。

1952年，十三岁，是《岳传》所传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我决定离开在印尼的温暖家庭，只身归国求学，并选择享有“老革命根据地”荣誉的东北，作为我在祖国的落脚点。从热带零上二十多度的印尼到北温带寒冬零下二十度，从天天吃大米到顿顿吃高粱和窝窝头，不但没有使我对自己的选择有所悔恨，反而更加深了参与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决心。

正是在东北，我在母文化的基础上，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同时又大量地阅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使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的少年青春期，被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所充实。在此基础上，十五岁那年，高中一年级，第一次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成为我的处女哲学读物。

毛泽东教给了我第一个哲学概念：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理论总结。这个哲学定义长久地指导我的人生观和哲学立场，促使我在十八岁

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把研究哲学当成我的终身第一志愿。为此，我要永远感恩和怀念毛泽东。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和康德先后激发和加深了我对哲学的理解。确切地说，在大学和研究生时期，我首先是以毛泽东的哲学定义解读马克思和康德。接着，马克思的哲学让我进一步学会将人的激情与哲学的反思结合起来，使辩证法的精神与生活的逻辑扭结合一，以大无畏的探索实践，寻求自然、社会和生活的真理。到了研究生阶段，在我的导师郑昕教授的亲自指导下，我用了三年半的时间，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及《判断力批判》三大著作，给了我关于人的认识、道德和审美三大基本能力的教育，让我领悟到“人作为目的自身”的最高尊严；同时也明白了人的理性及其界限，启发我要善于在生活中，依据具体情况，独立自主但又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理性。

1966年春天，我手持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文凭，到中国科学院报到工作，但迎接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这时，也只有这时，我对毛泽东、马克思和康德的哲学理解，才真正地受到了检验，我也受到了终生难忘的哲学教育。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个人的和亿万人的历史实践，像火焰翻滚的熔炉，熔化掉一切虚幻的理念和天真的情怀。我的个人命运同无情的权力争斗、亿万人的生离死别铰链在一起。这是我一生中最悲惨，但又最丰富、最珍贵、独一无二的经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虽然身在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地的北大哲学系，但我始终得不到机会认真系统地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文化大革命”对我长达八年的“隔离审查”，在门窗紧闭、暗无天日的戒备森严的环境中，我反倒获得了机会，让我反复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大卷及《资本论》三大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反复穿越毛泽东和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思想、语言论述、历史、生活逻辑、生命情感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神秘交错结构；同时，人类社会也以最典型的形态，暴露出它的正反两面性；历史的悲剧与喜剧，特别是迄今为止人们试图千方百计加以掩盖的那些最丑陋、最肮脏、最虚伪的正式情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都赤裸裸地同时生动地上演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历史浩劫，又是人性和兽性联合

同场演出的历史狂欢节。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获得的生存实践智慧，比我在任何时候所累积的经验都更深地扎根于灵魂的核心中，时时牵动着我的哲学思路。后来，即使到巴黎或台北，“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经常从无意识的底层冒现出来，影响着我對世界和哲学的看法。

从1978年离开中国大陆以来，我先后在香港地区、法国和台湾地区居住，也多次横渡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足迹遍布欧、亚、美。同我的生活经历一样，我的哲学研究领域，涉及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其实，我的学术领域的转移，同以往亲身经历的生活历程一样，一方面并非单向性和一次性的，而是循环的和重复的；另一方面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它是由三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是我的哲学研究本身，由于我对哲学持有开放的态度，促使我不由自主地从一个领域走到另一个领域；其次，思考本身的无形力量，特别是其中来自生命活动本身的非理性的情感和意志力量，超出我的主体意识，推动我不断越出学科的界限，不仅在不同哲学派别的文本中间穿梭，也深入到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理论等方面，试图在多向和多维的时空中，寻求新的自由可能性；最后，当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和不断转向过程，也引导我不断突破原有的范围。

在法国的二十五年，当代法国哲学家不断逾越传统哲学的边界，并与多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进行无拘无束的对话式的创新过程，使我心花怒放，带领我跨入无限自由的哲学新天地。

从1978年起，历经颠沛漂泊而进入“不惑之年”的我，终于领会到尼采为什么要以“超人”（der Übermensch）的激情，宣告人的生存的“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的本质。“文化大革命”所刻印的伤痕，早已见证了尼采的论断。其实，要真正实现康德所说的“作为目的自身”的人的最高尊严，不仅要靠理性和仁慈善心，而且还要凭借超人的权力意志及灵活机动的生存艺术策略，以鉴赏人生艺术的豪迈态度，敢于面对和逾越一切障碍和界限，大无畏地迎接人生的暴风骤雨，向一切“不可能”挑战，时时超越实际生活的范围，开辟新的生命境界。不能只是从“权力”和“意志”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尼采的哲学。权力意志是一种永不满足、永远自我更新、自我充实、自我扩大的逾越欲望，是彻底摆脱自然状态的、真正的人的永不

枯竭的生活动力，又是具有最高尊严的人，历练人生的纵横驰骋，泰然自若地出生入死，精通生死艺术，确信自己将“同这太阳、同这地球、同这雄鹰、同这条蛇一样”，“永恒地回归到同一个自身的生命”的崇高情操。人是在不断创造中实现自由超越的特殊生命体。哲学家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真正地将自身的思想同生活情感、同人类历史、同他人的各种文本连成一片。

实际上，没有一种真正的哲学思维是可以脱离实际的生命情感的。思维并不是只发生在某个孤立的主体意识之中；没有生活激情的思想是死板的，不同他人的文本进行来回交往的思索是贫乏的。在真正的哲学思考中，如同生活本身，理性、意识、情感、意志、欲望以及无意识等复杂因素，甚至包含一些无法说出、难于确定、不可预测的神秘力量，永远都混合在一起，而且也紧密地同思考者本身的生命律动及其生活世界相交错。哲学只有在同非哲学的比较、交往和对话中才能存在。哲学所追求的思想自由，使它本身无止境地自我超越和超越一切。

然而，超越本身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超越”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永不平静，更不归结为胡作非为。超越过程，包含了生活中必要的平静和节制，集中了生活和思维的艺术性。在我最近研究的福柯的生存美学中，我再次感受到超越过程的审美意义。

在出国流浪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通过穿越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的文本的迂回，在陆续总结生活经验和哲学思考心得的过程中，撰写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实用主义和语用论》、《罗素哲学概论》、《弗洛伊德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论》、《解释学简论》、《德国哲学的发展》、《罗素传》、《毕加索传》、《萨特传》、《利科的反思诠释学》、《布尔迪厄》、《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流行文化社会学》、《当代社会理论》、《论后现代艺术的不确定性》、《后现代论》、《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当代法国哲学导论》及《福柯的生存美学》等二十五本专著。由五百余万字所交织而成的文本，并不全是我本人所要说出的话语，因为生活和哲学思考所经受的体验和其中的情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如实地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重要的是它们毕竟以折射镜的方式，表现了我的生命律动和情感。但是，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书同我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具有本质意义的，在于它们是“他人”的文本的交响乐似的回音，隐含着

现实与历史、过去与未来、生与死、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永恒回归历程的和声。它们还不仅仅在形式上，更在内容方面，体现了生活和哲学生涯的流浪特质。

今后，只要我一息尚存，我绝不会放下笔，要不停顿地继续在广阔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文本间进行游泳穿梭。哲学没有界限，也不应该有终点；它同生命之间的永恒回归，正是哲学本身无可逃脱的命运及其生命力的源泉。

高宣扬谨识

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

人们往往只满足于观察流行文化的表面现象，甚至以轻蔑态度，简单地把流行文化当成下层民众所追求的通俗文化现象，把它拒之于学术研究的论题之外，不愿意具体深入地开展对流行文化的研究。但是，流行文化的泛滥及其无所不在的表演，不但嘲弄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而且也直接阻碍了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重要论题，都离不开对流行文化的研究成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许多创新和理论突破，都与流行文化研究中对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相互渗透现象的分析有密切关系。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研究流行文化，不论就其理论层面，还是就实际经验调查而言，都具有战略性理论意义，这不但是因为流行文化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的各个角落，成为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而且，还因为它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重要论题，诸如涉及当代社会的性质，当代社会中每个人的心理结构及其运作逻辑，以及涉及人文社会科学所关注的主体性、语言论述以及权力操作的网络等关键因素，因而也直接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向，对于深入了解正在迅速变化中的现代人的心理、爱好、精神活动及其社会关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方各国，从资本主义社会酝酿而创建初期开始，流行文化和消费就同资本主义整体经济之间，构成了相互紧密关联的三大重要因素，而且三者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循环发展模式，并从此导致三者关系的定型化和模式化。因此，各个时代最富有思想创造精神的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像英国的斯宾塞，德国的齐默尔和松巴特，美国的维伯伦以及法国的托克维尔和加普里尔·德·塔尔德等人，都很早就先后开展了对流行文化的研究，提出了足以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真知灼见。

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所提出的消费社会理论，勒菲伯尔的日常生活理论，埃里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利奥塔等人所提出的

后现代主义以及 20 世纪以来发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重大争论，都紧密地与当代流行文化所提出的社会文化问题紧密相关。

中国社会已经迈入现代化的新时代，流行文化也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卷入中国社会实际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认真研究流行文化的性质及其社会影响，已经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希望本书的出版和再版有利于推动这项复杂的研究工作。

高宣扬

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

2015 年元旦

20 世纪全球社会结构和人们心态的重大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使流行文化迅速地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泛滥起来。当代流行文化的出现和普及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但典型而全面地显示了 20 世纪社会文化发展的新特点，也预示着 21 世纪整个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且，流行文化同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也进一步使它的任何一点变化都成为整体社会变迁的重要迹象。在人类历史发生世纪转折的重要时刻，流行文化的发展同整体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后殖民化”、“本土化”的各种新趋势息息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研究流行文化，不论就其理论层面，还是就实际经验调查而言，都具有战略性理论意义。当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哲学、语言学、符号论、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理论以及美学等学科的最卓越的思想家们，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当代流行文化的兴起所隐含的重要意义。（Bailleux, N./Remaury, B. 1995; Barthes, R. 1983; Ariès, P./Duby, G. 1987; Bell, D. 1970; Baudrillard, J. 1969; Bourdieu, P. 1979; Bauman, Z. 1999; Alexander, J. 1989; Douglas, M. 1999）从那时起，西方流行文化、社会结构、人的心态和学术界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就形成同步发展而又相互渗透的“四重结构”。这四大方面社会文化力量，对当代整体西方社会、文化和人的心态结构的变迁及其发展，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理论的目光与生活的旋律使笔者对流行文化发生了兴趣，或者，更确切地说，引导笔者投入流行文化的洪流。笔者同流行文化的反复遭遇与对话，把笔者导向更深入的境界。在那里，笔者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后现代”都市时空中折射的幻影、橱窗里的时装、街上的车水马龙或人群中散发的香水气味，而是朦胧地混杂在其中的文化气氛和蒸蒸日上的神秘氛围。这一切，把笔者带入历史的长河，穿梭于既可爱又矛盾重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

在文化的广阔场域中反思。追随流行文化，但又不沉迷于它，对它投入，又保持自律，就会给我们带来青春活力，不仅获得理论的新生，而且也使自己的生命变得年轻。流行文化不仅使笔者进一步学会在生活中思考，体会到理论与生活的一致性，而且也使笔者无穷地回味生活的乐趣，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憧憬。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对于当代社会和文化的研究，笔者一直坚持系统地研究以法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象征论社会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特征，有机会集中地研究了西方当代文化理论以及当代西方文化的实际状况，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此前笔者早已进行多年的对于西方当代社会思潮的研究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布尔迪厄和鲍德里亚等人，以及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拉毕卡和德勒兹等，也都先后对笔者的文化研究工作给予了亲切而具体的关怀和指导。同他们的多次深入讨论和交往，使笔者得到很深的启示。在此期间，连续多年参与布尔迪厄所领导的“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所进行的文化研究计划，更为笔者在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实际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在近三十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不但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状况，也改变了社会和文化的结构以及中国人的心态和生活模式。由于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的改革也自然地引进了西方的流行文化。西方流行文化随中国现代化发展而势不可挡地在全中国范围内泛滥的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当代西方流行文化的威力，说明流行文化是当代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力。不但先进的西方国家，而且连发展中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也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流行文化的强大酵母和媒介力的影响。原来非常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竟然也招架不住流行文化的发展洪流。不但思想开放的中国青年，而且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中国农民，也深受西方流行文化的感染。北京这个东方文化古都，也受到了西方流行文化的冲击。北京的街道以及高耸入云的现代和后现代建筑群，充斥着流行文化的物品及其气氛。北京已经成为如同纽约、巴黎和伦敦那样的流行文化中心。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所显现的流行文化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值得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反省和深思。

当代流行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为此，必须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对流行文化进行研究，特别要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但对当代西方流行文化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基本理论的层面上。理论固然重要，有助于把握研究的方向和抓住事物的本质，但对于当代社会实际具体现象的观察和经验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流行文化的研究，更脱离不开对于具体的经验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在这方面，不论是早期的布隆代尔、埃里亚斯、松巴特、维布伦、索洛金，还是当代的布尔迪厄、罗兰·巴特、鲍德里亚，都为我们树立了将理论研究同实际经验统计调查分析相结合的良好榜样。

本书所引用的资料，大多数是笔者近十年来在巴黎和台北亲自搜集的。从数据搜集到撰写草稿、修改稿以及最后定稿，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包括 20 世纪的最后几年，并一直延伸到 21 世纪的最初岁月。时间的维度把笔者置于最幸运的历史时刻，得以观察到世纪转折时期的各种纷乱的文化现象及其创新与重构过程。而笔者近二十年生活于法国巴黎，又在空间上得到了观察和体验流行文化的最近距离和最生动的场域。巴黎作为世界花都，从来都是流行文化的发源地和倡导者。巴黎的街道商店就是最好的流行文化表演场所，而巴黎的居民，不管是其上流社会人士，还是其普通民众，都是流行文化最狂热的演员。在台湾地区，近三十年来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大大促进了流行文化在全岛的兴盛。台湾地区的最大都会台北已经成为模仿法国、美国和日本流行文化的先锋，而台北闹市区街道，特别是最繁华的忠孝东路、敦化南路和西门町的人流和橱窗，则是西方当代流行文化最积极和最生动的推销者和展览台。

由于流行文化本身带有明显的时代性，所以，笔者尽可能选用最新的书面和图片数据。每当本书进行一次新的修改，就采用直至修改当天所得到的最新资料。例如在 2001 年 5 月 19 日，当笔者在巴黎东郊寓所面对着计算机准备展开修改本书序言工作之时，笔者仍然以极大的兴趣和尽可能敏锐的眼光去寻求新的流行文化资料。动笔前，信步走到最近的书报摊浏览，居然发现当天巴黎《世界报》（*Le Monde*）出版了长达十六版的《首都时尚》副刊。这正好佐证了“流行文化时时处处呈现”的判断。一位美女的头像占满整个报纸第一版。美女的脸部皮肤涂上了以植物原料制成的化妆液，耳垂上悬挂着用贝壳制成的耳坠，口红是由植物原汁精工细作提炼出来的，头上戴

着由青草及树叶编织而成的草帽。《世界报》说,“生机美”(beauté bio)是当今巴黎最流行的时尚。(Supplément au *Le Monde* du samedi 19 mai 2001, No. 17516)一切回归自然。使用最新和最高明的当代科技手段,将自然界的植物及其原料精心加工,制成各种美化身体的化妆品。生活在科学技术产品充斥的世界,人们不再喜欢百分之百的科技化妆品,而是追求纯自然生物产品。但是,这种新的纯生物化妆品实际上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自然,因为它是经最新科技加工而制成的。这就表明现代生活的矛盾和悖论:既爱自然,又不是爱百分之百的自然;既创造了科技,又不喜欢百分之百的科技。流行的生命就在于它的时代性。不同的流行带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因此,结合不同时代流行文化史的分析需要,本书也精心选用了反映不同时代特征的史料。又由于各国流行文化带有明显的民族传统特征,所以本书也尽可能选用世界上各国各地区多民族流行文化的多元化原始资料。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简体本的修订过程中,考虑到流行文化本身强烈的时代性,笔者特地再次精选和增加了流行文化的新材料,尤其增加了自2000年至2006年年初的重要资料。

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学术界,对流行文化的研究尚处于开端阶段,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试验性和探索性。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推动对流行文化的研究,也有助于推动对整个人类文化的研究。为此,热诚欢迎学术界人士和朋友对本书提出宝贵的意见。

高宣扬

2002年夏完稿于世界花都巴黎

2006年1月23日简体修订本完稿于

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再版前言	(1)
初版前言	(3)
第一章 导论：流行文化及其研究的重要意义	(1)
第一节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流行文化	(1)
第二节 当代流行文化的重要意义	(8)
第三节 流行文化社会学简史	(15)
第四节 流行文化社会学的正当性	(35)
第五节 研究流行文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38)
第二章 流行文化的定义讨论	(49)
第一节 从现实中的流行文化谈起	(49)
第二节 流行文化定义的灵活性	(54)
第三节 广义和狭义的流行文化	(59)
第四节 作为一般文化和特殊文化的流行文化	(60)
第五节 流行文化的总定义	(65)
第六节 流行文化的现代性定义	(69)
第三章 流行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基本结构	(72)
第一节 流行文化的多重特征及其结构	(72)
第二节 流行文化的语言符号特征	(77)
第三节 流行文化的时间性及其时间结构的特殊性	(78)
第四节 流行文化的群众性	(86)
第五节 流行文化的日常生活性	(91)